

果把它看成是每個公民都能完成的的話，那它就帶有了民主的性質。精英思想並不一定與民主理念背道而馳，精英思想甚至可以是民主的。民主的精英思想強調的是「質量」和「素質」。無論一個人從事哪一種社會工作，他都要做得盡可能的好，只要做好了，不止是學術研究，任何工作都有人格培養和道德訓練的作用。有質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質的公民，因此離不開公民教育和自我教育。從這個角度來強調理性思考能力，便是提倡民主參與的素質。

對於一個講究學術品質的刊物來說，克服學術精英主義並非一件易事。學術分科越來越專門化，使得許多學術問題離公民社會建設越來越遙遠，也使得許多學術刊物將本來已狹窄的讀者群轉化為民主社會公眾的能力大大減弱。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一世紀》以其跨學科性和對公眾問題的關懷所發揮的公民社會公眾轉化作用，也就越加值得重視和提倡。

徐 賁 美國加州聖馬利亞學院英文系教授

直面中國的現實

徐友漁



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接點是現在，中國當下現實的極端重要性不言自明。且不說中國社會這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新現象紛至沓來，新事物層出不窮，新思潮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立場的大分化。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其實已經落在迅速變化的中國現實的後面。大陸個別刊物零零星星然而引人注目的討論與爭論，《二十一世紀》有更多更大的言論空間把問題研究得更深入。

我認為，由於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二十一世紀》最近十年在中國思想文化建設中作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貢獻。第一，關心和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第二，為大陸、香港、台灣兩岸三地學者提供了對話、交流的平台；第三，為中國學人和讀者了解今日西方學術文化潮流提供了窗口。《二十一世紀》創辦於90年代初這個特殊時刻，它為續存和發揚80年代以啟蒙、科學、理性、民主為主要訴求的新文化運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以上三個方面中，我最為看重的是第一個方面。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以來其命運真是苦不堪言，我們寄希望於未來，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但對未來我們沒有太多可以樂觀的理由。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接點是現在，中國當下現實的極端重要性不言自明。且不說中國社會這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新現象紛至沓來，新事物層出不窮，新思潮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立場的大分化。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其實已經落在迅速變化的中國現實的後面，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二十一世紀》在歡慶自己十歲生日，展望二十一世紀時，肯定會深感任重而道遠。

關於中國現實，我以為《二十一世紀》做得最好的是對於近代一百多年來社會、文化變遷的疏理和重新認識，尤其是對於50、60、70年代中國重大政治運動和社會轉折的研究，刊物所組織的專題討論和重頭文章，在中文學術界具有開創性意義，有時甚至給人「只此一家」的感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當前現實，尤其是對中國國情的認識。自9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一方面改革開放政策堅持了下來，而且在深入、擴大，另一方面，必須與之配套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卻嚴重滯後，二者的不協調形成了嚴重的扭曲和尖銳的矛盾。中國是否已然變成了市場經濟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和診斷是否應從對社會主義和威權或後極權社會的認識迅速轉變為對資本主義社會、後現代社會的認識與診斷？中國的問題主要源於內部社會結構與歷史延續，還是世界經濟格局與國際資本流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路在80年代有所恢復，到90年代是否不但不靈了，而且應當否定與清算？大陸個別刊物零零星星然而引人注目的討論與爭論，《二十一世紀》有更多更大的言論空間把問題研究得更深入。

如果說，《二十一世紀》在關注和研究今日中國現實方面的優勢是有較為充分的言論空間，那麼它的弱勢是容易與中國現實隔了一層。我前面談到的三方面重大貢獻，如果今後大陸言論尺度會有改善，我估計最容易失去優勢的就在這一塊。不過令人感到欣慰和慶幸的是，刊物的編輯對此似乎有較清醒的認識。

2000年這個世紀的轉折點和新千年的開端，不是在紀年學的意義上，而是在實質內容上，將在中國思想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一批思想者和學人，在1999年的狂熱喧囂和思想、道義立場的大潰退之後，力所能及而又全力以赴地表達出了某種艱苦卓絕的堅守。一些話語的種子與萌芽，只有在日後長大成林後，才能昭顯其意義。理論和思想立場的交鋒異常激烈，雖然思想、學術之外

的硝煙太濃，容易遮蔽其實質性內容和意義。理論與思潮的陣營在論戰中有成敗高下之分，但人們清醒地看到，具體爭論的勝負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中國的現實問題還是那麼嚴峻地存在着。得失是一時的，而中國的前途、命運是永久的課題。更何況，某些理論和思想立場是由種種具體的人在宣揚與捍衛，人的優劣強弱導致的論爭結局，並不完全反映理論和思想立場的優劣強弱。我和我的朋友願意與《二十一世紀》有更密切的合作，為更全面、深入理解與研究中
國現實問題共同努力。

徐友漁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多元文化在二十一世紀

張隆溪

文化差異的確是事實，但人類理性也同樣存在，因為現實中有強權的壓抑和非理性的行為就否定人類理性，或否定西方之外有理性，這是西方一些學者奇怪的思路。尊重文化差異是對的，但把強權的壓抑和非理性行為作為代表東方文化本質的差異來尊重或寬容，難道真是對東方的尊重嗎？

十年前《二十一世紀》創刊時，創辦人似乎考慮到十年之後即將進入一個新的世紀，明智地以這新的世紀為名。光陰荏苒，十年過去，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現在正可以回顧剛剛過去的世紀，並對我們面前這新世紀作一番推想和預測。也許預言未來一如事後諸葛式的檢討，都難免空言無補之譏，不過依據一些可以觀察到的迹象來展望未來，畢竟有別於完全不着邊際的幻想。東西方文化問題涵蓋面太廣，但我想討論的範圍卻很有限，即我們在未來十數年間，在文化理論方面，可能期待出現怎樣的變化。